



中国梦境随笔

□【巴西】雷南·奈尔伯格

提笔写下这篇随笔时,我还在倒时差。回到巴西后,我做了一个梦:我的房间幻化成一个巨大的飞机客舱,又变作一座悬挂着金色汉字、铺着红丝绒的剧院。这景象大概是我潜意识中对大唐芙蓉园演出场景的复现——该主题公园位于中国陕西省省会西安市。

那场演出是个惊喜,“文明的回响:2025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家专场)”为期一周,汇集了拉美地区15个国家与中国的诗人。在学术交流和诗歌朗诵的间隙,我坐在那个小剧场里,对眼前的舞台上即将上演的节目一无所知。

大唐芙蓉园是一处大型旅游景点,仿照唐代建筑结构复制而成,显示了诗歌备受推崇的唐代在西安市民集体记忆中的深远影响。回酒店的路上,我匆匆进了一家书店,买了一本诗集。据我的翻译索菲亚(侯潇英)说,诗集名为《唐诗一百零一夜》,显然是对《一千零一夜》的呼应。这本书由彭元鹤撰著,收录了72位诗人的诗作。其文字我尚无法解读,但该书版式插图的设计之美令人着迷。

这些汉字,是否就是不久前我看到的、被投射在舞台轻纱帷幕和剧场墙壁上的文字呢?

那场演出深深地打动了我:演员精湛的嗓音掌控、每种乐器(尤其是打击乐)被精准有力地演奏、光影在帷幕和墙壁上恰到好处的投射。一切似乎都由技术精确掌控,却又如此浑然天成,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一种初生般的清新感。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却得以沉浸在这个由肢体、动作、纹理、色彩和声音构筑的世界。

就在9月15日,星期一,我自己也曾站在一个舞台上——国际青春诗会的开幕式。与我一起的,有我的诗友们——阿根廷的埃琳娜·安妮巴利、哥伦比亚的亨利·亚历山大·戈麦斯、巴拿马的哈维尔·阿尔瓦拉多、秘鲁的卡鲁拉克米·普里里奈、中国的龙少等,还有诗歌朗诵者、舞者和电视主持人。后来我才知道,开幕式以电视直播的方式呈现给了中国观众,这证明了诗歌在当今中国文化生活中仍占据重要地位。

那一刻,我是舞台上唯一的葡语使用者。相比我尽心地把自己的诗歌《商船水手》朗读出来,聆听专业朗诵者用中文演绎它是更为美妙的经历。那些词语已不属于我,我却在节奏中找到了共鸣,中文朗诵者的演绎不时地让我感到熟悉。尤其是在最后一节,中文翻译还原了我的创作意图,汉语朗诵渐次断裂的声韵逻辑,模仿了苏伊士运河在地理上舒缓和收紧的形态变化。

9月16日,星期二,我登上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舞台”。我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参加了研讨会,宣读了论文《一个不可化

约之地,一种全球投射》,反思了口头语言的具体局限和诗歌翻译的无形桥梁。与定居西安的巴西籍教师希拉·莫雷拉·法里亚斯的交谈非常有趣。她和她的学生们——也是我们的导游和翻译——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更有趣的是,借助他们的帮助,我们得以接受中文采访,并与不懂葡语的中国朋友们交谈。如此一来,我们一起找到了拉近两个迥异的语言世界的沟通策略。

于我而言,中文是一门外语,而与中国语音体系的互动,在我心里生发了一种近乎弗洛伊德所称的“恐惑”。我捕捉到一些音素,尝试用我的身体去复现它们,察觉到我可以偶尔分辨部分语调的意义,但由于不掌握其编码规则,一切仍停留在朦胧地带,如同在梦境之中。

面对我不了解的书写系统,这种“恐惑”感更加强烈:每个汉字都如同一个神秘的密码,等待着一块未来的罗塞塔石碑来揭秘。漫步在西安或北京的街头,我变成了“文盲”。因为无法理解路牌和广告的意思,我只得依赖智能手机的摄像头来得到一些零碎的译文。我也用同样的方法对从中国带回来的书籍进行初步阅读。这样的尝试带有初始的意味,给我以喜悦,一如青春期每次迟钝发现带来的愉悦。

在那个下雨的星期四,看完演出的我们乘高铁从西安前往北京。和其他几位诗友需要准备一份简短的发言稿,并于次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重要会议上宣读。为此,我根据前一天早上独自散步时生发的灵感,草拟了一首短诗,题为《雨中的西安》:

清晨无言的灰色背景

预示着,远方,
某种凝思之境。
一只无名的鸟,
拖着长尾
(亦是灰色),
飞越
(亦是无言)
芙蓉路。
其他色彩也将涌现
(它们早已在此,沉睡着)。

一切无疑都是纪念碑式的,

却又如此精巧,

仿佛可以被当作

一盏丝质小灯笼,

在明晚静谧发光。

得知中国的朋友们对我的这些简短诗句,我很高兴。此次中国之行,我在千年传统与现代技术的独特共存中体察发现,在静默凝思与敏捷行动之间切换状态,在对自然的观察与对技术的运用之间有所感悟。这一切让我对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有了多一分的理解,同时也思



考着其与巴西文化可能的契合点。后者在时间尺度上短得多,但也同样被视为兼具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形式。

回到我的国家后,我买了一本唐诗选集的中葡双语译本。阅读序言时,我意识到,中国的千年诗歌与巴西书面诗歌的传统之间,也有相通之处。例如,在某种自由度下,律诗,也就是近体诗中的八行诗体结构可以被视为叠加两个四行诗节,而四行诗正是伊比利亚诗歌矩阵的基础。令人惊讶的是,近体诗的固定格律,似乎也与葡语中最常见的七音节诗和五音节诗的音步相吻合,尽管语言之间的结构差异会导致在翻译时需要在句法组织上做实质性的调整。

我想,这些初步的推测,专家们早已考虑过,并且很可能因缺乏历史依据而被摒弃。这两种传统以如此不同的方式发展,除了中国澳门存在的葡语世界这一微小例外——我曾与澳门诗人袁绍珊就此话题简短交谈。然而,正如墨西哥思想家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说的,诗歌的基础之一就是类比,即“隐喻,将异质梦想为统一体,将差异虚幻地投射为认同”。在迥异现象之间不可逾越的深渊上,诗人可以架起一座桥梁,就像在诗会期间反复出现的意象映照:安第斯山脉与中国长城一起出现。

或许是由于时差,或许是对不同语言的陌生,抑或是此次活动的丰富多彩,诗会期间许多拉美诗人常说感觉像在梦境之中。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在终南山游览时,雨水那样曼妙,似乎要与舞蹈服饰的色彩交汇,与乐器的演奏共鸣,与地方美食的陌生滋味融合。这种感觉在我回国后的头几天里仍在回荡。现在,我逐渐回归日常,但我并不想完全走出这个梦境。我打算尽可能地超越我作为诗人及诗歌学者的界限,打破我自身的语言及其他欧洲语言作为参照系的限制,加深我对中国丰富文化更为自觉的理解,永不走出这个中国梦境的朦胧地带。

(译者:侯潇英)

我偶然成了墨西哥人。同时,这片土地古老的文化确实塑造了我和其他墨西哥人共享的某种看待世界的视角,这种视角也在塑造着我个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在面对祖先留下的艺术文化成就时,那股骄傲的劲儿,那种展示给世界的姿态——总是带着忍不住想炫耀的心情,渴望别人也像我们一样,对我们国家拥有的宝藏惊叹不已。比如在对待像帕伦克、奇琴伊察、特奥蒂瓦坎等许多震撼人心的考古遗迹时,总会这样。

在中国,我也见识过不少宏伟的建筑。说实话,去之前我就知道长城了,而且必须讲一下,“长城”这个名字起得一点儿都不夸张。不光不夸张,简直谦虚过头了。那种砖墙的规模,叫“长城”实在大含蓄、太低调了。要我说,当初起名就该叫“超级长城”“巨大巨大巨大的——不骗你——巨型长城”“长城王中王”之类,才配得上那道望不到边的砖墙。跟墨西哥人不一样,中国人好像不太爱显摆自家的庞然大物。要知道,在墨西哥,随便走到哪个考古遗址,当地人可是个个昂首挺胸、满脸骄傲的。

在长城上、在兵马俑坑旁,我看到眼前景象时心中涌起的那股感受,就跟千辛万苦爬上一座高山、站在峰顶眺望地平线一模一样。我被彻底震住了,好像一瞬间,自己闯进了一个神仙待的地方。我感受到一种彻底的宁静,一种静默突然击中了我。壮阔的不只是外部的风景,还有我心底弥漫开来的内部的风景。我感觉自己就是这风景的一部分,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我甚至觉得,眼前的绝美一刻,似乎也因我的存在而更添光彩。时间仿佛屏住了呼吸,凝结成永恒,把这些地方的夕照雨幕,深深烙在了我的记忆里。而这些地方,是由人类亲手、几乎以超越凡俗的力量筑造而成的。

我唯一确信的是,如果你给一个中国人水泥、砖块、铲子和铁镐……那你可要发抖了,他将为你建起某种奇观。因为中国人身上的显著特点就是坚持和决心。中国人从不停止建设。我认为正是中国人为我们这个世界定立规矩,创造出计量劳动力的尺度。假以时日,中国人或许真能创造出宇宙本身。

二

谈到“构筑”这个话题,墨西哥人总爱向其他国家的人炫耀自己的历史财富和千年过往。可有时我觉得,我们像是把不属于自己的勋章戴在了胸前。我们与阿兹特克人、玛雅人、托尔特克人等,又有多少大关系呢?我常常想象,假如在某个永恒世界里的桥梁上,或者在一个能让我们看到平行宇宙、看到过去和现在交汇的分岔路口——就像博尔赫斯笔下那“小径分岔的花园”——遇见了他们中的一位,那位阿兹特克人、玛雅人或托尔特克人很可能对我说:“哥们儿,我根本不认识你。”

但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把那些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前西班牙时代原住民的历史和文化财富当作自己的一部分。我的血统让

□【墨西哥】罗伯托·阿库尼娅
对中国的随想

构筑宇宙

山水水,更懂得如何说出我们内心的感动,那种让你瞬间忘掉自己、和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情感。

长城,大概是天上某位神仙做过的梦,最后只有中国人敢把它从梦里搬到现实,还慷慨地敞开大门请我们进去看看。当我走在长城的脊背上,打心底里觉得该谢谢老天爷,多谢他造出了中国人。看着眼前这条石头铺成的无尽头的路在烈日下闪光,蕴藏着梦想,我忽然就明白了:老天爷造出千千万万中国人,不就是为了把这个梦变成真的吗?

三

中国存在一种本源的颜色:红色。陈列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大厅里总面积达600平方米的巨幅画作《长城颂》,是绝佳例证。整幅画里,红色包裹着长城,漫过山峦。那种红色让人想到日出落山的光景,暖洋洋的,像一团能烘热闹谈的篝火。

红也是火的颜色,是烧出兵马俑的窑火,是炼出撑起高楼大桥钢梁的熔炉火,更是炖煮梦想的炉火。所有的梦在这里上色、定型、淬火,直到它们冷却成真,稳稳落在“中国”这巨幅画卷上。

有时我会这样想,中国人自己就诞生于某个中国人梦中的灶炉。而那位造梦者又源自另一个中国人的梦境。就这么一环扣一环,如此往复直至无穷。在中国,每一场幻梦都是新生。

有多少中国人,就有多少梦。

在我看来,中国就像刚从梦里抽离出那般,是一场惊醒后要立刻提笔写下的迷梦。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铸就梦中中国的文字肌理。

到底是中国在我的梦里,还是我活在中国的梦里?

(译者:史林)

2025年9月4日

奥列佳轻快地出现在我面前。这位年轻的画家还是原来的样子,保持着从前的活力。我们已经七年未见,这七年间她为我的故事绘制了很多插图。

我们一起去到了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看画展,她为我解释那些赫赫有名的画作。她不会中文,我不会俄语,我俩一直用微信的文字翻译功能交流。每次在俄罗斯看画展,我都有新的发现和惊喜。我坚信,能看遍俄罗斯的油画也就拥有了整个俄罗斯。

傍晚,我们在画廊附近的露天小店吃东西。这时得知她刚刚当选系主任。她说同事们正在联

俄罗斯纪行

□薛 涛

其中有三位短篇小说大师对我影响很大,这幢房子永远的主人——契诃夫就是其中之一。那些年,我固执地认为,要成为优秀的作家必须从短篇小说写起,于是连续写了近百个短篇小说。那些小说最短的千八百字,最长的也不过五六千字。我误以为写得多就一定会好起来,写到足够多就能写得像契诃夫一样好。事实却并非如此。当然,我也有别的收获,比如通过阅读契诃夫,我了解到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和日常生活。他的小说写了那么多普通的人物,且经常揭露他们的短处,讽刺当时的社会现实。他笔下的小人物虽然各有毛病,却并非单薄如纸,反而个个都有丰腴的灵魂。

阅读一部经典,我们往往会对它所在的国度产生好感。在契诃夫的时代,俄罗斯还拥有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那么多了不起的作家。他们写出了经典,对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有精彩的描绘,也作出了深刻的剖析,那些剖析甚至带着血和泪。当我们吃到一棵树上的苹果,它又香又甜,我们不免会低头看向苹果树下的土地,心想这块土地一定不错。

2025年9月9日

我们来到亚历山德拉剧院,契诃夫曾经把

什么呢?她们也说出了自己的回答。我告诉她们,中国可能是一首诗歌。

罗流沙教授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你希望你的作品为俄罗斯读者带来什么”。我非常看重不同国度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学艺术的交流像初恋,纯粹、深情、难以忘怀。是的,俄罗斯文学于我而言就像初恋。这些年,我有两部作品在俄罗斯翻译出版。一本是长篇小说《九月的冰河》,还有多次加印的绘本《河对岸》,它的绘者是俄罗斯功勋画家安娜斯塔西亚。我还有一部绘本《邀人跳舞的小兽》,它的绘者是俄罗斯画家欧尼可夫,他曾经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我在书中充满“偏见”地提醒这个世界——孩子们往往是好的,有问题的肯定是大人。当然,这些作品还讲述了人与万物的平等关系,充满了对生命尊严的讴歌,呈现了我的生命观、自然观、宇宙观。我猜这或许也是俄罗斯读者关注的地方。

很多年前,契诃夫的戏剧《樱桃园》在莫斯科大获成功。那时候契诃夫已经得了肺病,正住在雅尔塔。这个好消息没能让他的病情好转。他对雅尔塔的天气又喜爱又蔑视。这多像我们钟爱的文学与戏剧,它们陪伴人类走过无数个夜晚,抚慰我们、温暖我们,但是第二天太阳升起,我们可能又将面对生的艰辛和病的痛苦。好在只要我们能熬下去,接下来还有无数个夜晚,我们还能在月光下阅读,在夜幕上观看斑斓的斗转星移。

活动结束时恰好也是夜晚。月光下的涅瓦河水面斑斓,似有一场盛大的歌舞剧正在上演。从前去俄罗斯,四周挂满油画;这次去俄罗斯,处处还有契诃夫。

